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
暨“历史上中外文化的和谐与共生”
学术研讨会

论 文 集

主办单位：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会议时间：2013年10月19-20日
会议地点：中国·石家庄

目 录

康熙大帝、路易十四与天主教入华·····	耿 昇 (01)
异军突起: 16-17 世纪的漳州青花瓷·····	万 明 (16)
岭南园林与中外文化交流——以番禺余荫山房为例·····	纪宗安 (23)
康熙皇帝与正定关系考述·····	戴建兵(自带论文)
燕赵自古通海外·····	施存龙 (27)
一幅中西合璧的明代中国航海图·····	孙光圻 (35)
船政文化的兼收与融通·····	沈 岩 (36)
中国与琉球群岛戏剧文化关系研究·····	李 强 (41)
中琉航海与钓鱼岛问题·····	谢必震 (52)
《琉球诸岛图》是宋君荣绘制的吗? ·····	廖大珂 (58)
近代欧洲的茶叶贸易与中国茶文化的西传·····	武 斌 (66)
元代杭州中外文化的和谐交融·····	鲍志成 (74)
晚清同文馆从“西文”向“西学”的转变·····	陈海燕 (83)
公元 5—10 世纪灵州粟特人发展史研究·····	陈 玮 (88)
清中叶天主教在华乡村传播策略与管理模式·····	陈文源 (103)
敦煌写本《发病书》叙录·····	陈于柱 (110)
《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再考略·····	崔红芬 (119)
中国西藏与缅甸关系及边界划定·····	董莉英 (133)
认知、市场与贸易——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燕窝贸易·····	冯立军 (140)
从麻风病的传播蠡测汉唐时期古印度药材的内传·····	高 凯 (150)
谈谈越南和新加坡文化及其与中国文化之关系·····	古小松 (151)
以文史互证看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	郭华伟 (152)
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唐武惠妃石椁“胡人驯兽图”再探讨·····	韩 香 (159)
从西魏第 249 窟龙凤驾车图像论敦煌艺术的模仿性·····	胡同庆 (171)
德国皮藏晚清直隶省县级舆图的学术价值·····	华林甫 (179)
史籍中所见的在唐新罗商人·····	姜清波 (185)
九山禅学: 论韩国对中国禅的早期受容·····	李海涛 (196)
墓志铭映印下的唐朝河北粟特人地著化问题——以米文辩墓志为核心·····	李鸿宾 (202)

跨文化融合：中国近代教堂艺术的本土化嬗变·····	李丕宇（213）
近代直隶乡村天主教民皈依动机探析·····	李晓晨（220）
晚清学人的西方历史发展观及其影响·····	刘雅军（238）
华夷秩序扩大化与朝鲜、日本之间相互认识的偏差·····	刘永连（247）
《史记》在俄罗斯的收藏与翻译·····	柳若梅（256）
敦煌民俗乐舞服饰图像研究·····	卢秀文（268）
河北的伊斯兰文化与穆斯林历史·····	陆 芸（277）
简论民国时期（1911-1936）浙江对外贸易研究·····	马 丁（285）
中学与西学的交流与共融——清法国传教士田嘉璧墓碑及相关问题·····	明晓艳（299）
晚清玻璃画与中外文化交流探微·····	莫小也（306）
从 feudum 到 feudalism ·····	倪世光（312）
建构先祖：越南莫朝王室家族谱系研究·····	牛军凯（319）
利玛窦在华交游人物补·····	庞乃明（326）
徐福求仙与日韩长生不老文化·····	曲玉维（333）
对佛教造像中狮子座的初步考察·····	尚永琪（337）
东晋南朝佛教三宝供养风俗·····	石云涛（343）
朝鲜半岛早期居民起源研究·····	孙 泓（354）
商族玄鸟图腾之探讨·····	孙文政（368）
民初丹麦探险家哈士纶在焉耆土尔扈特部的考察·····	吐 娜（374）
东干人在中亚和谐发展模式探析·····	王 超（379）
利玛窦视野中的中国法律·····	王超杰（387）
纵观明朝与李朝关系的历史继承性·····	王东芳（397）
清入关前对朝鲜的贸易及影响·····	王 臻（408）
《佛说父母恩重经》的流传及其思想探原·····	王志鹏（415）
朝鲜司译院“汉学”与《老乞大》·····	乌云高娃（416）
千年佛教区与京畿义和团·····	吴宝晓（423）
“刀伊入寇”——关于女真人袭击日本的考察·····	修 斌 吴 起（446）
燕赵文化与齐鲁文化的异同·····	吴兆路（455）
清末直隶正定府天主教堂建造纠纷·····	徐建平 冯子轩（457）

中阿博览会：中阿文化交流的延伸·····	薛正昌（460）
论古代瘴疠对岭南文明进程的影响·····	阎根齐（464）
试论中国近代初期郭嵩焘的中西文化观与和平外交策·····	于海君（472）
黎贵惇的世界观与中国古代思想学术影响·····	于向东（480）
张光藻与清末津案探析·····	余 雷（自带论文）
明末西洋望远镜传入中国轨迹·····	余三乐（492）
朱元璋与郑梦周——明朝与高丽王朝外交关系个案分析·····	袁晓春（494）
利玛窦在中国成功传播欧洲数学文化的原因探析·····	曾 峥（504）
1995 年以来国内鸠摩罗什研究综述·····	张开媛（509）
西班牙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初探·····	张绍铎（519）
对 1940 年前后英、法扣留我国外贸货物交涉的再思考·····	张天政（522）
明代西域来华使臣的违法与违禁·····	张文德（534）
晚清国人海外游记中的西方人类学展示·····	张晓川（543）
15-16 世纪中国与文莱的海上贸易·····	张一平（551）
赵武灵王开启中国古代异域服饰融合先河及之后中国官服的主要融合·····	赵连赏（560）
域外看长城——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的长城印象与观念·····	赵现海（564）
浅析英国传教士苏慧廉的汉学研究·····	郑叶凡（575）
明初化解中日关系困局之探讨·····	朱亚非（586）
汉藏文化在尼泊尔的交汇·····	朱悦梅（587）
近代铁路技术向日本的转移——兼与中国铁路技术引进的比较·····	祝曙光（601）
从青州地区出土的西域货币及丝绸之路的源头看中外贸易·····	庄明军（614）

康熙大帝、路易十四与天主教入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耿昇

内容提要：中国大清王朝的康熙大帝与法兰西帝国的路易十四大帝，是 17—18 世纪欧亚大陆两极的两大圣君。他们的从政经历有许多共同之处，虽为专制君主，也不失具有许多开明政见。这两大君主之间还曾有过许多间接的联系。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士学者到中国，甚至是在清朝宫廷中效力。他们既向中国传授西学，也将中国传统文化传向西方。康熙不仅热情接待和积极支持入华耶稣会士们的工作，而且还数次向路易十四遣使送批礼，形成了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路易十四也先在法国，后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场“中国热”风潮，并持续了 1 个多世纪，使西方认识了一个“神秘的”中国。

关键词：康熙 路易十四 耶稣会士 中西交流

Chinese Qing Emperor Kangxi, French King Louis XIV, and the Catholic into China

Geng Sheng

History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ese Qing Emperor Kangxi and French King Louis XIV were the two great monarchs of Eurasia bipolar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They had much in common in the political experience. Although were despots, they also did not lose many enlightened places. The two monarchs had indirect contact. Louis XIV sent Jesuit scholars to China, even effect in the Qing court. The Jesuits both taught Western knowledge to China, also transmitte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est. Kangxi not only had warm reception and active support for Jesuits' work into Chinese, but also several times sent the missions with gifts to Louis XIV. All the contact formed the first impact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Keywords: emperor Kangxi; king Luis XIV; the Jesuits;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18 世纪时，在欧亚大陆的两极，几乎是同时出现了两大圣明君主，也出现两大强盛的帝国。这就是东方亚洲的大清帝国和西欧的法兰西帝国。中国这个伟大时代的缔造人是康熙大帝（1654—1722 年）。康熙擒鳌拜、平三藩、收复台湾、南巡江浙、亲征噶尔丹、平定西藏、出兵雅克萨、驱逐沙俄入侵、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开建圆明园、尊崇理学并编修《古今图书集成》等多部类书、改革赋税、治理河患，开创了“康乾盛世”。

路易十四（1638—1715 年）大帝是法国盛世时代“路易十四时代”或“伟大时代”的缔造人。他对抗马札兰的摄政，起用科尔贝尔主持经济革命，兴建凡尔赛宫，吞并部分佛兰德地区、洛林和弗朗什—孔泰地区而扩大法国版图，支持大作家莫里哀和拉辛等人的文学创作。伏尔泰称他可与古罗马的奥古斯都皇帝相媲美。无论如何，他也是使法国达到鼎盛时期的最杰出人物。他被人奉为“太阳王”，开创了法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代，成为欧洲古典时代专制君主的典型象征。尽管其时代的邻邦和历史学家们，对其历史功过的评价，也有许多不同看法。

在康熙大帝与路易十四大帝的经历中，出现了许多惊人的相似性或巧合处。他们的执政过程和历史伟业，异曲同工之处屡见不鲜。对他们作一番比较研究，便会使人获得许多出乎

预料的发现。

在这两位历史巨人之间，由于历史的契机，也出现了许多间接的联系。他们之间联系的媒介，正是入华耶稣会士们。他们之间纠纷的原因，也是由于天主教的入华问题。他们一个是天主教的虔诚信徒和忠实保护人，是号称“第一天主教帝国”的皇帝，也是西方步入近代社会的历史巨匠；另一个本为儒家文化的忠诚信徒和坚定捍卫者，也是对西方近代科学产生浓厚兴趣的天朝君主。在这两个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的历史伟人之间，所建立起的跨洋联系桥梁，既导致西方对进入中国产生兴趣，又激化了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传统文化的情绪。无论如何，对于这两个人物的经历及其关系的研究，确实具有重大意义。

一、两大历史巨人高度相似的青少年时期

当法国路易十四国王(Louis XIV)即位(1643年,5岁)时,正处于“伟大时代”(专指路易十四时代的17世纪)的曙光期或破晓期。清圣祖康熙帝登基(1662年,6岁)也即将开创“康乾盛世”的伟大时代。中国历史上于同一时代出现了许多重大事件:自1368年开国的明王朝已经被清王朝彻底推翻,南明王朝历时18年的顽抗,最终于1662年随着桂王永历的被诛而平息。1643年于盛京即位并于1644年迁入北京的清世祖顺治帝,事实上并不是满清的第一位皇帝,因为在他之前太祖和太宗已经有近20年的执政期了。

法国路易十三(Louis XIII,1501—1643年)也是10岁登基(1610年),由其母玛丽·德·梅第齐(Marie de Medeci,1573—1642年)摄政,他最终依靠首相黎塞留(A-J. du Plessis, Richelieu,1585—1642年)的辅政,才得以最终排斥后党并屡屡平叛成功。1617年,年轻的国王终于成年而亲政。

大清王朝开国初年,其对外政策并未经历重大变化,在许多方面承袭了明朝的外交政策。北京的新朝廷维持了与澳门葡萄牙人的传统关系,甚至让广州港对外半开大门。当时,尽管某些欧洲传教士与中国天主教徒的高级官吏仍在为南明流亡小王朝服务,但北京也允许德国入华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年)继续留在皇宫内,仍以他那些科学知识和设施为清朝廷服务。他还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隶属礼部¹。顺治在位18年,继孝献皇后(董鄂妃,1639—1660年)死后,他决定退位。其三子玄烨(诞生于1654年)于1662年7岁时继大位,即康熙帝。

路易十四年长康熙16岁。当时法国的形势却令人不可思议地与中国相似。路易十四诞生于1638年9月,是一个天资聪慧、性格坚强而又相貌堂堂的孩子,于1643年5月14日继任其父路易十三。摄政权在名义上归于其母奥地利人安娜(Anne d'Autriche,1601—1666年),但她并不关心国事,摄政权实际上是由马札兰(Jule Mazarin,1602—1661年)操控,马札兰是由女摄政任命的首相,因为路易十四当时只有5岁。路易十四执政的最初几年,正值1618—1648年间的(以德国为主战场的一场国际战争)“30年战争”时代,反专制主义的“投石党”运动(La Fronde,福隆德运动,1648—1653年)猖獗一时,同时爆发了国会反对马札兰摄政及其内阁的斗争²。

康熙登基时,明王朝的残余势力仍在徒劳无益地负隅顽抗。1623年诞生并自称为明王

¹ 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S.J.):《1552—1800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Rome et Paris, 1973)第747号传主。

² 费德鲁(C.Federu):《马札兰,1602—1661年》(C. Federu, Mazarin, 1602-1661, Paris, 1934),巴黎1934年版。

朝正统的永历帝逃往缅甸，叛明降清的吴三桂迫使缅王引渡永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康熙才是平定整个中华帝国的第1位清朝皇帝。他留任了在前朝时入华的耶稣会士汤若望及其教士们。

在法国，后来出任巴黎大主教的博蒙（Préfète de Beaumont，1605—1670年）成了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之一，传授天主教教理；康熙自称在5岁时就开始学习阅读中国的儒家传统经典¹。康熙幼年所受到的教育与路易十四完全不同，路易十四的学习因马札兰的“计谋”而被荒废了。

鳌拜于康熙幼年，在宫中握有很大权力，他与几位辅政大臣，形成了朝廷的真正主人。法国马札兰同样也是路易十四国王的监护人。他对于路易十四的专制比鳌拜对待康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两位未来国王，乃至世界的一代圣君，与当时受监护的孤儿的爱情，也具有极其相似的经历。路易十四非常痛苦地忍受其专制而又暴虐的监护人。一天，年轻的法国国王恰与在一支盛大而又隆重的卫队保卫下的马札兰迎头相撞，于是国王便充满讥讽地高呼：“奥斯曼大苏丹正经过这里”²。康熙在13岁时也再不能忍受鳌拜以及那些贪婪的辅政大臣们了。所以，年轻的康熙帝与路易十四，马札兰与鳌拜，都有极大的相似性。鳌拜与马札兰均以粗暴的方式对待其幼年懦弱和未来强盛的主子，这些未来的盛世君主也很难与其摄政们的傲慢和蛮横无礼相调和。中国和法国这两位新君主的保护人，都是由其父先皇或国王在临终或退位之前，于最后时刻钦定的，属于“托孤”性质，并由“母后”监护。当康熙辅政四大臣中最年长者索尼病逝时，康熙认为时机已成熟，希望通过1667年8月25日的敕令而结束摄政并亲政，但仍保留了鳌拜的大臣职务。鳌拜以大逆罪而处死苏克萨哈作为报复。康熙仍保持冷静。直到1669年才除鳌拜，整饬其帝国的政府与国内局势。

中国在康熙初年的形势，与法国的形势也具有很大的可比性。法国当时在马札兰政府的统治下了，深受投石党运动与附近地区的战争、政府与议会之间冲突的干扰。马札兰是黎塞留红衣主教的直接继承人，也是优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是意大利血统，曾忠实地为其收养法国的利益服务。“其血统不是法国的，其心却是法国的”。1651年9月7日，年长13岁的路易十四达到了亲政的年龄。但马札兰仍继续掌权，国家也并未由于其外交政策而辉煌，国库收入锐减。马札兰个人的贪婪严重玷污了其名望、其个人生活及其政务活动。路易十四对他当然很不满意，仅仅出于对母后的尊重才肯容忍他。相比之下，康熙却表现得并不那样宽宏大量，对其“太皇太后”（祖母）孝庄皇太后也并不太尊重。据伏尔泰认为，在路易十四年轻时代，法国的生活必需品匮乏。他有一次曾致书其税务总监富凯（Fouquet）：他要接待一名客人，“王库中一无所有，但红衣主教先生（马札兰）可以借给你”³。未来的路易大帝几乎“生下来就是国王”，迫不及待地等待结束这种漫长而又强大的摄政局面。马札兰的摄政，一直延续其生命的最后日子⁴。

马札兰肯定不是奥地利安娜王后的“宠臣”。路易十四至少在宣布亲政时，曾与康熙有过相类似的举措。他本来在10年前，就可以如同康熙所作的那样，摆脱那种专制的监护或

¹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

² 埃尔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史》（Ernest Lavisse,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la révolution）第7卷，第1册，第110页。

³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Voltaire, Le Siècle de Louis XIV）第14章，第35页。

⁴ 圣西蒙：《路易十四的宫廷》（Saint-Simon, La Cour de Louis XIV），巴黎版，第300页。

“训政”。在这两位政治家的能力之间，也可以比较。总之，我们可以认为年轻的康熙比路易十四更为勇敢和更为干练一些，因为他们的社会背景完全不同。

马札兰逝世于1661年3月9日。某些法国媒体曾奉他为“国王的保护人和法兰西王国享有受益权的人”¹。马札兰根据其听告解神工神父的建议，自觉地将其巨额财富奉送给了国王。但在3天之后，路易十四在其母亲的影响下，将这笔财富又退回给他那已处于弥留之际的保护人。人们估计马札兰红衣主教的全部资产约为1亿镑。它们是来自国家的、教会的和27家修院的财产，他成了它们的拥有者或保护者。马札兰被指责盗窃国家资产²。他的政治对手雷斯枢机主教（Cardinal de Retz, 1613—1679年）曾宣布说：马札兰“枢机主教通过他漫溢到政府的作弊行为而暴富”³。尽管马札兰的教阶地位很高，但他在这一点上却远不如其同代的鳌拜那样诚实。世人都承认，马札兰直到逝世，都忠实地扮演其法国国王监护人和政府首脑的角色。他在临终前还向路易十四提出了许多忠恳的上谏。他最后一次向路易十四传授了独自治理法国的韬略以及成为伟大君主的秘诀。马札兰的长期施政，为路易十四开创了一个辉煌和昌盛的时代。法国人还是纪念马札兰的，现今法兰西学院门前的大街被命名为“马札兰林荫大道”。康熙却独自推动了其大皇帝的事业。

康熙年轻时代，一位穆斯林高级官吏杨光先（1597—1669年），对于曾经参与改革中国历法的欧洲传教士汤若望很愤怒，怀有一种嫉妒和仇恨的情感。杨光先于1664年挑起了一场反对欧洲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们的大教案。汤若望与其3位教友：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年）、利类斯（Louis Buglio, 1606—1682年）和安文思（Gabriel Magalhães, 1629—1677年）一并被捕。汤若望被判处死缓，其教友们被判入狱。在中国内地各省的另外26名耶稣会传教士，都被押解至广州，并被安置在受到严密监视的住院中。汤若望的生命被其强大的女保护人皇太后挽救了，但他在被释放之后不久便于1666年8月15日逝世。北京朝廷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1671年，康熙为传教士们平反昭雪，杨光先失宠⁴。

二、“朕即国家”

中国的康熙大帝于1667年亲政。法国在6年之前，于马札兰逝世的翌日，大主教在法国圣职会议上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国事可问谁？”路易十四立即回答：“问朕”。年轻的国王即以这样简单而又有力的两个字，承担了专制君主的职责，开创了法国的“伟大时代”。在历史上，法国的“伟大时代”，专指该国17世纪的路易十四时代。由此，便产生了路易十四的一句世人皆知的名言：“朕即国家”。康熙也认为，一位君主的首要义务，便是谋求其政权的辉煌和其臣民的幸福、安定公共秩序和实现帝国的繁荣。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主动采取了许多政治与军事措施。他的第一项措施，便是将政治、军事和行政的所有权力，都集中于自己一人之手，只希望一个人施政，不要首辅及内阁。他被奉为“天子”、天朝的最高元首、4亿臣民的绝对主子，无法容忍任何藩部势力。这实际上也是“朕即国家”。中国在1673

¹ 拉维斯：《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史》（Ernest Lavisse,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la Revolution）第7卷第1册，第110页。

² 达拉斯（J.B.Darras）和巴莱伊（J.Bareille）：《教会史》（J.B. Barras et J. Bareille, Histoire de L'Eglise）第37卷，第5册。

³ 同上引拉维斯书，第114页。

⁴ 荣振华：同上引《1552—1800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第747和883号传主。

—1682年又爆发了一场内战——三藩之乱。康熙于内战中获胜，彻底统一了中国，迎来了“康乾盛世”的一道曙光。

路易十四在执政初期，法国也处于混乱之中。该国当时刚刚摆脱了其双重考验——投石党运动与对外战争，全国到处都出现了无尽的政治和社会冲突，特别是在国王与教皇之间的冲突、基督宗教教团内部（新教与冉森派、加利教派或法国教会自主论派）之间的冲突。法国民众仍在忍受着财政危机。这种事态，明显正是长年动乱以及马札兰和富凯摄政时代弊端的必然结果。

1661年9月5日，马札兰逝世之后，富凯被捕并以侵吞公共财产的罪名被判刑，他必须为其强势保护人付出代价。马札兰经过19年的囚禁之后，死于意大利的彼格耐罗尔（Pignerol）小城堡中。尽管路易十四终生受其“朕即国家”思想的主宰，但他身边还是聚集了多位贤臣良将：科尔贝尔（J.-B. Colbert, 1618—1683年，财务大臣）、卢瓦侯爵（Michel Louvois, 1641—1691年，陆军大臣）和利奥纳（Hugues de Lionne, 1611—1671年，外交大臣）。康熙却一意地依靠个人的活动治理整个国家，不大相信任何人。因此，这两位君主的各自处境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的坚强意志、远大抱负、高超的手段、渊博的知识、娴熟的治国术等，却非常相似，并且都特别具有意义。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在东西方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环境中，在相似的背景下和相同的时代，中法两大君主开创了两大帝国同样的辉煌。

正当康熙集中精力统一其帝国并开拓疆土的时候，路易十四也使法国跃居欧洲诸邦之首，使他自己也高高地凌驾于其他国王之上，成为“欧洲第1帝国”。他为了扩大其帝国的版图，也发动了多次征服战争。英国在传统上是法国的敌对国，路易十四首先想到的，便是阻止英国在欧洲大陆扩张其势力。1662年，他以500万英镑的代价，从英国人手中赎回了敦刻尔克（Dunkerque）。他以遗产归属的名义向西班牙宣战。法国军队攻入佛兰德，并且占领了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大区与荷兰等地。路易十四是一位卓越的外交家，他有时将其邻邦视为盟友和朋友，有时又视之为对手和敌人；他与这一批国家屡屡签订和平与结盟条约，有时又废除与其他国家的条约与协议。法国历史经常指责太阳王过分酷爱发动战争，从而耗竭了其国力。康熙也具有同样的骑士精神和荣誉抱负。他于1690—1697年平定了西蒙古诸部，尤其是额鲁特部（Eleuthes）；接着，他又先后平定了新疆四部和外蒙古，于1718年平定西藏。康熙也如同路易十四一样，多次御驾亲征，亲自指挥军事行动。他还想阻止俄罗斯向其北方地区与边境的推进，接受了与沙皇彼得大帝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从一次胜利走向另一次胜利的康熙帝，是否会预见其强大帝国的衰落呢？1557年，澳门被置于了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自从航海大发现之后，葡萄牙航行者以及所有经商国家的冒险家们，都在策化他们的殖民征服计划，希望将印度和远东所有国家都变成欧洲扩张的猎物。正如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年）所说的那样：“康熙较那些不忠诚王公们所占的上风，几乎与路易大帝面对基督徒王公们所具有的共同优势”¹。

三、康熙和路易十四与教廷的关系

大清政府赞助过天主教传教区在中国的布道活动。它是由罗历山（Alexandre de Rhode, 1591—1660年）于1651年在罗马，然后在巴黎的活动而开始的。罗历山是法国在远东的第

¹ 白晋：《康熙皇帝传》（J. Bouvet, S.J., Histo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第6页。

一位传教士，也是印度支那天主教传教区的创始人。正如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年）是中国传教区的创始人一样。罗历山于1623年到达澳门，有时又居住在交趾支那，有时也会居住在广州。他经过在葡萄牙“保教权”制度下，艰难地布道25年之后，便返回欧洲，以在那里为交趾支那、北圻、暹罗和中国寻求主教和招募传教士。尽管罗历山作出了不知疲倦的努力，同时还受到了罗马和巴黎强有力而又多方位的支持，但他却始终无法获得理想成果。1655年，根据其长上们的决定，他又前往波斯。其法国教友们，仍在继续由他确定的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布道计划。

1658年5月13日，经过法国圣职会议与教廷的多年间犹豫、协商和谈判之后，教廷传信部向亚历山大七世教皇推荐，任命图尔圣玛丹的译事司铎陆方济（François Pallu, 1626—1689年）、鲁昂宫廷的原律师郎主教（Lambert de La Motte, 1624—1679年）为中国、交趾支那、北圻和暹罗等地的挂名主教和宗座代牧¹。陆方济于6个月之后在罗马晋铎，1660年，教廷传信部任命了法国的第3位宗座代牧依纳爵·科多朗迪（Ignace Cottolendi）。这3人后来都是巴黎外方传教会赴远东的传教士。

随着这些任命，除了菲律宾和澳门教区之外，整个远东地区的传教区，事实上都由法国宗座代牧主持了。他们完全脱离了葡萄牙教区。但里斯本政府也不会坐视不顾，葡萄牙国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重申其在亚洲传教区的义务和特权。因为这是在两个世纪之前，由教皇谕旨正式确认的葡萄牙“保教权”。

直到路易十四登基的1643年，法国与中国和印度均无外贸交流关系。英国人与荷兰人，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在远东与葡萄牙商人或海员竞争了²。路易十四希望扩大法国在天朝帝国的影响，于是便为这3位法国宗座代牧分别发放1000镑的年金，后又增加到3000镑³。总之，罗历山奠定了法国在远东传教的基础。他也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主要创始人。该传教区于1663年9月7日，获得了路易十四的批准，并捐赠1.5万法郎做资助。陆方济于1662年1月2日从里昂出发首次赴远东，这是在国王批准对他的任命之前1年零8个月的时候。当他离开巴黎时，路易十四又交给他多封分别致交趾支那和北圻国王以及中国皇帝的推荐信，说明他派遣这些传教士的目的，就是要告知远东国家的君主们，他希望与他们维持良好关系。据陆南（A. Launay）认为，由于陆方济携带着路易十四的信件，所以他几乎成了教皇与路易十四的官方大使⁴。尽管他具有这种传教士与外交官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责，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却封锁了他前往中国的所有道路，陆方济只能在暹罗作短时间停留。他要求罗马发表教廷传信部1677年12月6日的通谕，这道通谕禁止所有欧洲传教士、司铎以及中国教经先生，要发誓服从和孝忠由教廷任命的宗座代牧们。到了两年后的1680年4月15日，陆方济返欧，被罗马任命为中国所有传教区的司教总代理。至于服从和孝忠的誓言，则

¹ 热拉尔·穆塞（Gérard Monssay）和布里吉特·阿帕乌（Brigitte Appavou）主编：《1659—2000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列传》（Gérard Moussay et Brigitte Appavou, Répertoire des Membres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 1659-2000）第012和001号传主。

² 卫清心：《法国在华的传教政策，1842—1856年》（Louis Wei, La Politique missionnaire de La France en Chine, 1842-1856），第36页。

³ 贝列维奇—斯坦凯维奇：《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中国热》（H. Belevitch-Strankevitich, Le gout chinois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V, Paris, 1960）第1页。

⁴ 陆南（Launay）：《巴黎外方传教会论集（1865—1913年）》（A. Launay, Mémorial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1658-1913），巴黎1916年版，第2卷，第489页。

仅仅被视为是对教宗的全部和普遍权力的承认¹。

陆方济一直未找到进入中国的办法。这是他在巴黎遇到的第一大障碍。路易十四国王的听告解神工神父拉雪兹 (de La Chaize, 1624—1709 年), 曾要求路易十四进行干预, 以回应入华宗座代牧们的苛求。路易十四根据法国教会法, 声称宣誓是“以赋予主教一种绝对权力, 却有害于他对自己某些臣民的权威”。人们由此而提出了一个问题: 宣誓是否会构成对王权的一种公开践踏呢? 是否会导致法国公民发誓忠于其他人而不是自己的国王呢?² 1680 年 6 月, 陆方济失去了路易十四的信任与尊重。愤怒的国王拒绝召对他。陆方济为了重新获得国王的宠爱, 思考再三而认为, 除了修改由罗马确定的誓词之外, 再无其他良策可图了。他仅仅从誓词中加入了一句话: “在国王的允许下……”³。事实上, 路易十四找到了一种最佳的解决方案, 他对于陆方济的才智感到很满意, 于是便赐予所有被任命为宗座代牧的法国传教士一个“皇家秘书”的尊号、权力和特权。

在罗马, 在法国国王的“国王特权”事件中, 严重触怒和受侮的英诺森十一世教皇, 强烈地反对这种在誓词中冒险增加的内容。教皇认为, 这是法国宗教自主论对教皇权威的冒犯。陆方济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很暧昧和很神秘。人们一方面怀疑他是冉森派的支持者, 另一方面又指责他是路易十四的秘密代理人。法国宗教界又将他视为唯罗马之命是从者。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认为, 陆方济是一个化装成罗马高级神职人员的法国政府间谍。澳门的葡萄牙人在很长时间之前, 就秘密地在狱中为他准备了一间囚牢, 以等待他的投降⁴。

陆方济错误地估计了情感变化的严重后果, 罗马面对这位法国高级神职人员的行为准则和忠诚, 认为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了。教廷传信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名意大利方济各会士伊大仁 (Bernardin della Chiesa, 1644—1721 年)。他是一名值得教廷信任, 并且思想和行为谨慎的人, 于 1680 年在教廷传信部的小教堂中晋铎。教廷然后便以陆方济主教的辅理主教身份, 把他派往中国, 但他却拥有更广泛的权力和更秘密的目的。1684 年 1 月 27 日, 伊大仁偕其教友严嘉乐 (Charle Maigrot, 1652—1730 年, 又名阎珩) 到达福建港口厦门, 伊大仁则于 7 个月之后到达广州。陆方济一旦到达中国, 便致信所有欧洲传教士与中国司铎, 要求他们向他发孝忠和服从的誓言。事实上, 这一切却完全落空了。尽管他拥有充分的权力和权威, 但仍遭到了葡萄牙传教士们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样的服从行为确实与葡萄牙在远东的保教权相悖。葡萄牙国王也在保护其传统的权益。在这样的背景下, 此种混乱状态给中国皇帝、地方当局和中国基督徒们, 都造成了令人烦恼的误解。

当时天文学家和汉学家南怀仁, 陆续赢得了教皇英诺森十一世的信任和康熙皇帝个人的尊重之后, 于是他便致信教廷传信部。他于信中解释说, 天主教传教区的命运取决于中国皇帝本人的意愿。中国皇帝高度评价了其宫中著名耶稣会士们的科学工作。他同时又指出: “康熙帝对专制权力的贪婪和对他人不信任的态度, 使他介入了这场争讼。”南怀仁明确地宣布, 激怒皇帝的要害之一, 恰恰是被强加给所有传教士的这种孝忠和驯服的誓言。南怀仁提出质

¹ 陆南:《巴黎外方传教会通史》(A. Launay,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Paris, 1894, 3vol) 第 1 卷, 第 249 页。

² 路易·博迪芒 (Louis Baudiment):《陆方济传》(Louis Baudiment, François Pallu), 巴黎 1934 年版, 第 366 页。

³ 陆南:同上引《巴黎外方传教会通史》第 1 卷, 第 250 页。

⁴ 高龙鞞 (Auguste Colombel):《江南传教史》(Auguste Colombel, S.J.,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第 2 卷 (无出版时间), 第 397 页。

疑：“为什么在中国要强迫人作这种宣誓呢？因为在那里，根本不存在于邻国尚存的导致这一事件的致因”。他希望“将此问题留作悬案，以使传教区免遭灭亡”¹。南怀仁还曾两次致信第一位中国司铎和主教罗文藻（Grégoire Lo, Lopez, 1611—1691年），信中告知他说，当有人获悉传教士们要向宗座代牧宣誓孝忠和驯服时，那就会出现殃及新生教团的严重威胁。南怀仁同样还通知陆方济说，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他的北京之行计划显得很不合时宜，因为传教士们在中华帝国京师的处境只是形成了一个特例。南怀仁还请求陆方济，为了中国教团的利益，必须极其谨慎地行事²。

罗马准确地预见到了在中国教团内部挑起的这场争讼，而且这也是教廷传信部向中国派遣伊大仁的原因，因为其使命正是平息宣誓事件。伊大仁利用了他手握的特殊权力，撤消了由陆方济发起的对23名传教士的停职处分，也就是处分那些分散在不同修会和不同国家的拒绝发誓的传教士。陆方济很辛苦、孤立无援，而且又患重病，其生命已处于强弩之末了，最不幸的是他还处于失宠状态。教廷传信部背着他剥夺了过去委托给他的传教区的所有地盘。他只剩下一个“司教总代理”的名誉性空头衔了³。陆方济经过在华9个月的居留之后，于1689年10月29日逝世，未能收获他付出巨大努力和作出惨重牺牲的果实。

罗马为了维持中国天主教传教区的内外和平，最终根据伊大仁的调解建议，废除了宣誓的义务，尽管遭到了陆方济临终前亲自指定的继承人严家乐的强烈抗议。

陆方济并非仅仅是法国在华传教事业的先驱，他也是法国殖民政策的缔造者和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始作俑者。正是他向路易十四的政府建议，在中国海岸建立商行⁴。他本人共承担3项任务：布道、发展法国在远东和特别是康熙统治下的中国的贸易、加强太阳王在这些遥远地区的光芒普照和影响远播。

罗马自教廷传信部创建起，便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办法，使远东传教区摆脱葡萄牙保教权的枷索。但教廷也应该是采取了一应防范措施，以阻止建立另一种“保教权”，即法国路易十四确立对于同一地区的保教权。因为该君主，至少也是对教皇相当独立的法国教会自主论的保护人，甚至还可能是其长上。路易十四明显不仅仅希望能使法国传教士们，既摆脱在布道国受葡萄牙主教的管辖权，同时又摆脱罗马“主教”或“代理人”对“司法权限”的羁绊。

在中国，康熙也如同路易十四一样，非常嫉妒罗马的绝对权威，因为罗马希望居住在中华帝国并处于自己保护下的传教士们，或者是中国本国的信教臣民，都能够向某个外国权威机构发愿。

在信仰基督宗教的欧洲，路易十四始终是当时最强大的君主。伏尔泰认为他是“欧洲唯一的国王”。尽管他是“典型的基督宗教国王”和“教廷长子”，但他却不允许教皇重返其国（阿维尼翁），甚至在纯宗教领域中也如此。他后来反对英诺森十一世，以便捍卫法国教会的权力、自由、权威和独立，同时还捍卫国王对于那些主教府缺位教区的世俗统治权。路易十四甚至走得更远，其理论基础是宣扬一位君主、一位国家元首拥有的“天授之权”，自认

¹ 《南怀仁书简集》（Ferdinand Verbiest, S.J., Correspondance de Ferdinand Verbiest, publié par Josson, S.J. et Willaert），布鲁塞尔1938年版，第442页以下。

² 同上引书，第453页。

³ 同上引博迪芒：《陆方济传》第249—258页。

⁴ 洛内：《巴黎外方传教会通史》第1卷，第299—301页。

为国王是上帝在大地上的“代理长官”。他当然是想在教宗（基督的代理人）面前炫耀这一切。法国国会也只得把教皇本人视为一位外国王子了¹。

中国康熙皇帝也自认为是天子，也是整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也自信是受天命者，是“代天行道”。所以中国人便称其皇帝为“陛下”或“天皇”。中国从来未曾公开承认接受一种国教，国家始终是自由的，处于一切之上，通过圣命而统治和控制国内的一切。由中国文人和哲学家们对于宗教所下的定义，事实上仅仅是一种伦理、政治和社会的修养。

路易十四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国王。康熙则在不同程度上是一位儒家伦理文化的国王。这两位同时代的非常强大的君主，其个人观念和思想修养差异很大，但却有同样的天才、同样的智慧和同样的抱负，他们执行了一种具有共性的政策。因为他们首先都希望完整地保卫其全部主权，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君主。

四、路易十四的数学家耶稣会士进入康熙宫廷

正值路易十四国王和英诺森十一世教皇，在国王与教皇各自对于教团的权力之争的高潮中，康熙帝却允许南怀仁以耶稣会副省会长的名义，向其欧洲的教友们发出一项感人的呼吁，请求他们派遣大批有学问的传教士入华，特别是天文学家，以便及早确保北京宫廷对他们的保护²。

在巴黎，受国王支持的耶稣会士们热烈地响应了南怀仁的呼吁。陆方济的失败，并没有使路易十四气馁。路易十四也被北京的请求感动了，便委托法国科学院院士和巴黎天文台台长喀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 1625—1712年），为他制订一份中国工作计划³。但如果当时的人要执行法国的计划，那就必然会遇到许多严重障碍，首先就会遭遇执著于“保教权”的里斯本宫廷的反对。除了菲律宾之外，远东的教团都被视为葡萄牙王廷的国家专属区。路易十四为了攻克这第一大障碍，便以一种外交家的敏捷手腕，决定向中国派遣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这批耶稣会传教士们更多地是具有科学家风格的学者，而不是传教的神职人员。但路易十四也没有忘记，另一大困难也可能在罗马出现。经过长期的犹豫不决之后，路易十四本人也亲自向耶稣会士拉雪兹神父下令，不要与教廷而是与耶稣会总会长共同协商处理这一事件，至少是从总会长那里获得一种明确的准许，一种有利于凡尔赛宫廷的意见。耶稣会总会长非常谨慎。他明显既不想冷落葡萄牙，也不愿意对教廷传信部失去信任，更不想触怒法国国王。他由此而接受了巴黎的建议，不过却附有某些保留条件。拉雪兹神父最终是根据路易十四的敕令，选择6位准备入华的耶稣会士。国王通过1683年1月28日的一道由科尔贝尔附署的敕令，赐予其新选中的传教士一个“国王数学家”的头衔。他们由此而形成了传教士与科学家的第一次赴华远行。这6人分别是：路易大帝学院的数学和天文学教授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年）、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年）、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年）、张诚（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年）、刘应（Claude Visdelou, 1656—1737年）和塔查尔（Guy Tachard, 1648—1712年）⁴。

这个国王布道团的目的，是赴中国传播福音、发展科学以及传播法国的影响。其中有一

¹ 彼得·布莱（Pierre Blet）：《法国早期的教廷大使和主教》（Pierre Blet, *Nonces apostolique et Prélat de L'ancienne France, dans Etudes*），载《研究》杂志，1960年10月，巴黎版，第38页。

² 若松（Josson）和维拉尔特编：《南怀仁书简集》。

³ 上引博迪芒《陆方济传》第366页。

⁴ 荣振华：同上引《1552—1800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第326、106、456、360、895和821号传主。

位传教士讲过：“国王陛下对于宗教的虔诚，比对于其政权的辉煌和强盛的关注更强烈”¹。对于罗马教廷传信部要求的宣誓服从问题，大家都认为法国耶稣会士们是“国王的卓越臣民……，只会根据王国的法律和法国教会的特权行事，不会接受教廷传信部的任何命令”²。

那些即将赴华的耶稣会士们以“国王数学家”的身份，在出发前都被接纳进了法国科学院，获得了科学仪器，并且还享有一笔年金。但科尔贝尔的逝世，却将他们的出发时间延迟了一年半。他们最终于1685年3月3日从布列斯特（Brest）乘坐“乌瓦索”（Oisseau）号船启程。这是一般配备46门大炮的战船，由路易十四派遣出使暹罗国王的大使肖蒙（Chevalier de Chaumont）骑士陪同。次年9月，第一批法国赴华耶稣会士们到达暹罗，并在那里居住9个月。塔查尔神父于1686年返回法国，完全是为了陪同暹罗国王派往凡尔赛宫宫廷的使节，才赴巴黎的。

这5位耶稣会士为了不落入葡萄牙人手中，他们避开了经由澳门进入中国的习惯途径。1687年7月3日，他们直接在中国向外商贸开放和距上海不远的宁波港下船登陆。传教区的长上洪若翰立即致信南怀仁，通知他说他们一行已顺利到达中国。南怀仁通知了中国皇帝，宫中邀请这5位耶稣会士赴京。康熙传诏说：“那些懂得数学的人，将留在朕的身旁，以为朕效力。其余人将赴他们觉得对自己合适的省份”³。

路易十四的使者们于1688年2月7日到达北京。但南怀仁却在10天前逝世。他于病榻上嘱托其保护人君主：“主子，我将愉快地死去，因为我几乎利用了我一生的全部时光为陛下服务。我卑微地恳求您，在我死后，您还能记得起来我所作的这一切，我只想使东方最大的君主，能成为世界上最神圣宗教的一名保护人”⁴。这些新来的传教士们于是便为南怀仁服丧，于3月18日面对皇帝的钦差而出席其葬礼。3天之后，到3月21日，法国耶稣会士们受到了康熙皇帝的召对。根据中国宫廷的定制，皇帝本人向他们赐茶，这是荣誉的标志。根据康熙的钦命，白晋和张诚留在宫中，坚持从事科学工作。洪若翰和其他人，则被派往其他地方。

在法国国王的半官方使者进献给中国皇帝的礼物中，便有路易十四的画像。下面就是李明向太阳王介绍的印象：康熙“以使其宫中震惊四座的尊重表示接受您的画像。我在看到他时，完全可以说，中国的一位皇帝首次感到，世界不是只有一位君主”⁵。

1689年3月29日，康熙钦定张诚和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昇（Thomas Pereira, 1645—1703年），出任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的大清皇家代表团的翻译官。该条约于1689年8月签署。在谈判期间，两位耶稣会士外交家很好地完成了其职责。他们不仅仅是做为翻译官，而且还是中俄两位全权大使之间的调解人，因为两国大使的立场有时分歧很大。

康熙为了犒赏耶稣会士们在宫中作出的贡献，于1692年颁布了赞助基督宗教的一道圣旨。他允许传教士们于其整个帝国中，自由地到处传教。康熙甚至说：“如果朕决定接受基

¹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第17240号，第246页。

² 同上。

³ 洪若翰致拉雪兹神父的书简，1703年2月15日，载《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Edition Pantnéon, Paris, 1843, 4vol）第3卷，第91页，先贤祠1843年版本。

⁴ 李明：《中国现势新志》（Louis Le Comte, S.J.,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Etat Présent de La Chine），巴黎1696年首版，第1卷，第75页。

⁵ 李明：同上引《中国现势新志》第11页，1696年巴黎首版。

督宗教的归化，那么朕的整个帝国都会随朕宣化它”¹。

五、康熙大帝派向路易十四的钦差白晋神父

康熙皇帝对于法国国王数学家们的才能与忠诚，感到非常满意。他希望拥有更多的这类传教士，于是便派遣白晋神父做为他的钦差返回法国，并且携带赠送路易十四的御礼，包括在北京刊刻的 49 部中文典籍，它们形成了法国皇家文库（巴黎国家图书馆前身）中文典藏的基础。白晋还奉命为中国皇帝征募更多的法国耶稣会士学者入华。他于 1693 年 7 月 8 日离开北京，于 1694 年 1 月 10 日在澳门登船返欧，但直到 1697 年 3 月 1 日才到达法国，受到了法国国王十四的召对。白晋在他的那部献给路易十四的著作《中国皇帝的历史》（《康熙皇帝传》）中，向路易十四介绍了一副生动的康熙皇帝的形象²：

“陛下于数年前给他（康熙）派去的耶稣会士们，在大地的另一边缘，惊奇地发现了人们直到当时尚在法国之外从未见过的一切。这就是一位如同陛下一般的王子，再加上一种既高尚又坚定的天才、一副与其帝国堪相对应的心肠。他是他本人及其臣民之主，同样也受到了其臣民的崇拜，受到了其邻邦的敬重。无论他于其大业中获得多少荣誉，具备多高的道德和品行，而不是幸福。一句话，在该名王子身上汇聚了形成一个举世英才的大部分高尚素质，从而使之成为最完美的君主。他长时间地在大地上统治……皇帝委托给我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命令我重新征募传教士，这才使我有幸向陛下介绍他对您最大尊重的表示”³。

白晋向路易十四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国将会给予法国所谋求的有利处境和贸易自由。他请求国王向中国派遣一艘船。路易十四对于康熙帝向他献殷勤的行为颇受感动。但这两位满怀抱负的君主，从来也未曾想到在他们之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实在说，虽然康熙帝胸怀宽阔，但依照中国传统，他也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那样：“他只将路易十四视为一位蛮夷王子，而且又是迟迟不肯向他称臣纳贡的王子。他由此而只接受那些为他服务的传教士们”⁴。

至于路易十四，他多次表现出了对康熙的好感。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2 年）写道：路易十四“不肯违背法国国王从不向中国遣使的习惯，以不损自己的尊严”⁵。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凡尔赛宫廷及其大臣们，面对白晋的计划，均犹豫不决。大家认为，很难相信白晋及其教友李明在路易十四面前所炫耀的一切。

康熙皇帝的钦差白晋感到很懊恼。他抱怨说：“我们国家的习惯是倾向怀疑自遥远国家返回的人所陈述的一切，这可能会使我感到害怕，人们不肯赋予这些回忆充分信任，而他们所写报告时的完全忠诚，本来应该是值得给予这种信任的”⁶。所以，白晋的外交使命并未获得圆满成功，尽管他作出了巨大努力。白晋在返回中国的旅行中，直接求助于法国东印度公司，并且得以成功地招募 10 位新教友。他们共同于 1698 年 3 月 6 日在拉罗歇尔（La Rochelle）港口，乘坐 500 登记吨位的安菲特利特号（L'Amphitrite，海神号）船舶，由拉骆

¹ 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Louis Pfister, S.J.,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en Chine, 1552-1773*），1932 年上海版，第 43 版。

² 白晋：同上引《中国皇帝的历史》，巴黎 1697 年版，第 6—7 和 153 页。

³ 伯希和：《安菲特利特号船首航中国记》（Paul Pelliot, *Le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 en Chine*）第 25 页，巴黎 1930 年版。

⁴ 同上引文，第 24 页。

⁵ 雷慕沙：《亚洲新论集》（Abel Rémusat,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Paris, Vol 2*）第 2 卷，第 41 页。

⁶ 上引白晋《中国皇帝的历史》结尾部分。

克 (La Roque) 骑士指挥, 首航中国。他们于同年 11 月 2 日抵达中国广州港¹。

安菲特利特号船仅仅是一艘商船, 但中国人在白晋神父的鼓动下, 却把它视为法国国王的一艘御船, 来华“朝拜皇帝”²。路易十四采取谨慎态度, 也完全有理。白晋也仅仅为中国皇帝带去了一本装帧豪华的拓片集³。当康熙获悉自己出使欧洲的钦差即将返归时, 于是差遣两位传教士——葡萄牙耶稣会士苏霖 (Joseph Suarez, 1656—1736 年) 和法国耶稣会士刘应赴广州, 以最高的荣誉规格迎接白晋等一行。安菲特利特号船于 1700 年 1 月 26 日离开广州。洪若翰乘船返回法国。他经过 7 个月的航行才到达巴黎。此人也如同白晋一样, 向法国国王赠送了“华丽的丝绸、漂亮的瓷器和许多大块茶砖”⁴。

六、中法两国君主都争做科学、艺术和文学的保护主

路易十四时代始终是法国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伏尔泰曾把太阳王比作教皇列昂十世 (Léon X), 也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 法国经历了可能是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它以文学所有领域的一批传世的代表作而著名, 同时还拥有一批具有世界性价值的艺术家。凡尔赛宫廷就如同过去佛罗伦萨的梅第奇宫廷一样, 这是一个黄金时代的摇篮, 也是培育各类天才巨匠和明星的苗圃。

康熙也如同路易十四一样, 是艺术和诗歌的爱好者。北京宫廷拥有了某种科学院, 或者是一个中国—国际的“凡尔赛宫廷”。贤明的皇帝身边聚集着文学家、诗人和艺术家, 其中便有法国、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德国和其他国家入华的学术型或工匠型耶稣会士。在这种文化和科学的发展进步之中, 我们首先应该提到由皇帝钦定编修的中文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律吕正义》和《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圣训》等。正是在皇帝的保护下, 南怀仁、白晋、刘应、李明、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 年)、雷孝思 (Jean-Baptiste Régis, 1663—1738 年), 还有其他许多耶稣会士汉学家, 在北京撰写和发表了一大批精辟的有关中国科学、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礼仪和基督宗教教义的著作。这些珍贵的著作成了中国教团的真正文化遗产, 并为传教事业打下了辉煌的基础, 而且也是海外汉学的奠基工作,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彩重抹的一笔。

康熙皇帝重组了翰林院, 修订了国家科举制度, 建立了科研机构和学校, 为准备考试的举子们提供便利条件。康熙也如同路易十四一样, 赞助大作家、大诗人和大艺术家。他很快就赢得了中国文化界的尊重, 世人高度评价其超人的智慧和深邃的中国经典知识。他同样也学习西学, 如数学和欧几里得几何学、天文学、哲学和拉丁文。他还拜多位欧洲耶稣会传教士为师, 请他们给他上课, 特别是南怀仁和白晋等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的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帝王, 实属了不起。

白晋神父在致路易十四的报告中写道⁵:

“当我们向皇帝解释完全部实用几何与纯理性几何时, 都必须根据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保持的顺序向他施教。该帝王非常高兴地能成为几何学家, 向我们表达了其高度的满意,

¹ 上引伯希和:《安菲特利特号船首航中国记》第 7 页。

² 同上引文, 第 54 页。

³ 上引白晋书, 第 434 页。

⁴ 同上引贝勒维奇—斯坦凯维奇 (Belvitch-Strankevitch):《路易十四时代的中国热》, 巴黎 1966 年版, 第 61 页。

⁵ 白晋: 同上引《中国皇帝的历史》第 96—97 页。

从而使我们看到了这几部著作颇为符合其情趣。他令人将这几部书自鞑靼文译作汉文。他不辞辛苦地亲自御笔序言……他令人重新审阅了原稿，以便付梓印刷，然后再用两种语言文本在全国公开发行，以便由此而实施他草拟的将欧洲的所有科学都引入中国的计划，并于其帝国内开设有关课程。他此后还亲自向年长 17 岁的第 3 皇子讲授我们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因为他发现该王子具有优良品德和天才，很适宜学习这类科学”。

1703 年，洪若翰在致拉雪兹神父的一封信中，叙述了耶稣会士们怎样准备为皇帝授课的教材：“神父们被迫每天都前往距北京有 2 法里远的畅春园，无论天气好坏都一如既往。他们从清晨 4 点钟自北京出发，仅到夜幕初降时才返回。他们刚刚返回，便立即着手工作，利用夜间的一段时间，编写和准备第 2 天的授课教案”¹。

康熙根据巴黎科学院的模式，在北京创立了一个同类科学院，还有一座观象台。伏尔泰于其《路易十四时代》中，表现出了他对康熙的高度敬仰：“这是一位爱好欧洲艺术的君王”²。

康熙大帝在对其帝国内各省的多次巡视中，每次都邀请几位宫中的耶稣会士随銮待行，以便测绘地图并研究地理方位、勘察地下财富和测量气象等项目。在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士学者们，与巴黎皇家科学院保持着从不间断的联系，经常向那里寄送其科研成果，由此而为法国海军部和外贸部对外开辟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有一位传教士，向路易十四呈上了在南京建造一座由法国国王保护下的天文台计划。它以北京观象台为模式，并将向巴黎通报其全部观察成果。他指出：“大家都认为，再没有比这项计划更能有利于维持我们两国间的互相尊重和友好关系了，它可以使做为世界第一帝国的法国国王，成为基督教世界的第一位和最强大的君主”³。路易十四也如同其母奥地利的安娜公主一样，非常喜欢中国艺术品，尤其钟爱“中国的家具或者是以中国方式作布置”的房间⁴。

在康熙朝廷的保卫下，法国的入华耶稣会士们都成了汉学家学者。他们布讲基督宗教，并向古老的中国传授欧洲人发现的新科学，尽管欧洲人直到当时仍在深化发展这些科学成果。这些大传教士们同时也自我充实提高，发现了一种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的高尚与辉煌。他们发现，中国在许多科学领域中，其实并不逊色于西方。他们的心身都变成了中国人，成了当时世界上少有的中国通，中国成了他们选择的定居国。那些派往康熙时代中国的大布道人，都成功地研究了孔子及其学派。他们希望与中国古代思想相和谐的基督教哲学，能够在中国打下牢固基础。这完全如同过去的那些基督宗教的大哲学家圣·奥古斯定 (Saint Augustin)、阿奎纳 (Saint Thomas d' Aquin)，曾与诸如柏拉图 (Platon) 和亚里士多德 (Aristote) 那样的希腊大哲学家们相结合一样。

这些著名的入华耶稣会士们，把一大批中国经典译成了拉丁文和法文。在 17—18 世纪的法国，介绍中国事物，变成了国王宫廷和社会名流们沙龙中最时髦的谈话内容。这种对中国事物的迷恋，激起了路易十四时代法国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们的浓厚兴趣。这是东西方两大文化界接触的起源和互相交流的蹒跚步履，从而打下了人类两大古老文明交流的基础。路易十四国王与康熙大帝无疑为这种交流的最高层推手，社会各界的需要是其原动力，入华

¹ 同上引白晋书，第 131 页。

² 伏尔泰：同上引《路易十四时代》第 510 页。

³ 巴黎国家档案馆，中国部分，F.5，A.21。

⁴ 同上引贝勒维奇—斯坦凯维奇书，第 87—93 页。